

密雲不雨

二月河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密云不雨/二月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06 - 9

I. 密… II. 二… III. 散文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9032 号

密云不雨

作者: 二月河

责任编辑: 懿翎 朱燕 汉睿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5.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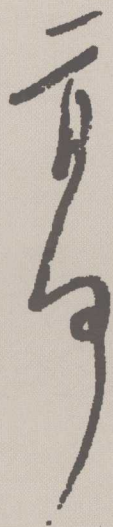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06 - 9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原名凌解放，1945 年生于山西昔阳，1968 年入伍，1978 年转业至南阳。40 岁开始创作生涯，主要作品有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等系列小说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《红楼梦》学会河南理事。





二月河在家中小院门口。

1.

1945年农历9月29，这个阴寒的深秋，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偏僻的山庄，我出生了。这个地方叫南庄，也称南李家庄。在昔阳县正北偏东，倚浮山襟神山，傍莲花山、凤凰山……前后左右都是山，也有一条河，叫铺沟河。你打开地图，根本就找不到这条河。但我曾经见过这条河，是满沟的石头蛋子，大的犹如卧牛，小的鸡蛋许大，干得几乎见不到水。以至于我在后来写书，起笔名时根本就想不到它。我想的是“二月的黄河”。

近来，我的长兄凌振祥写了一本《二月河源》的书，我才据典忆祖，明了了家族的历史概貌：开基之祖是兄弟二人：凌德环、凌德源。明代末叶迁来开荒，兄弟二人兄居岗上，弟居沟底，繁衍生息继以世代，遂成人丁七百余人的凌氏大家族。比凌德环再早，已不可考。这次我游山西，到洪

洞县，忽有所感：是否可能来自大槐树下？

我曾祖父一代时，还算比较“牛”的，兄弟四人三秀才，伯凌朝徽，是食廩秀才，仲凌瑞徽是贡生，叔凌杞徽为庠生——我的曾祖父是凌朝徽。一门三秀才，这在江南极平常，在北方，山左山右一带，是十分了得的，方圆百里提起来，都是称先生而不名，“大先生、二先生、三先生”如何怎样。这个影响通逼今日，人们称道“二月河你们知道是谁？是大先生的曾孙！人家那叫祖上有德……”

这是曾有过的辉煌，晚霞的绚丽，似乎至今还放着毫彩之光。我的理解是，打从我的祖父凌从古这一代，家道开始发生令人——兴奋？激动？悲伤？忧虑？……这些变化，不不……不是这样的，用“感怀”“惆怅”也许更合适，我则用唏嘘这个词。

2.

我家的“成分”问题

爷爷的照片现今留存得有，但我见过爷爷一面。那是1953年，我八岁，父亲探家带上了我。我的大哥说“你当时很怕他（爷爷）”。但我的回忆不是这样。我只是觉得好奇与隔膜。那是冬天，太阳暖暖地洒落略带金黄的光。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大门口外的石头上，表情有点呆滞地看着远处。过

来过去的人有的挑担有的扛农具，路过时和他打招呼：

“老汉——文明小（我父小名）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还好？”

“啊、啊，还好。”

“你快走了吧？”

“啊、啊，快了，快了。”

这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。我现在已过耳顺，仍像昨天那样清晰。“走”就是“死”的意思——问得自然答得简洁、坦然。这在其他地方如何？我不晓得，在河南是犯忌讳的，肯定没有这事。

他真的很快就“走”了。留给我的应该说不是怀念，而是带泪的思索。

1937年抗战爆发。他把长子凌尔寿送进了抗日队伍；次年，他又送走了二儿子凌尔文（我的父亲）。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，只有这两个儿子，都送走了。而家里总共九口人。三十四亩地，请了一个叫“歪牛叔叔”的来做长工。两个儿子都在我党的根据地打仗，凌尔寿在河北武安牺牲——这无论如何说都是个爱国老人。应该受到表彰的，而他受到的“奖赏”却是“富农成分”。

二月河源

祖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农民，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深明大义、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。他说：“国家，国家，有国才有家。”他以坚定的理念，顽强的毅力，超凡的忍耐，不顾自己年老体

衰，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，在国家危亡时刻，将两个儿子、一个儿媳、一个女婿送上了抗日战场。儿女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而他在后方勤劳耕作，捐款捐物，赶着毛驴送军粮。几次被日伪抓去，险些被活埋在县城外的西河滩。老人家恪守的是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这么一个简单的公理，从来没有奢望和等盼社会或老天爷能给他什么报偿。只是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期待着战争的胜利，全国的解放，儿子能回来，他能享些许天伦之乐。

祖父的期盼最终也没有实现。迎头等来的是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；远方传来的是大儿子牺牲的噩耗。而首当其冲的“革命者”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凌尔文。

大约是1946年夏，叔父回来了。他头戴大檐帽子，身穿灰色军装，左胸前有一块长方形布块，上面写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标志。当时，部队鼓励家庭富裕的军人，回家做工作，把多余的土地主动“献”给贫苦的农民，叫做“献田运动”。儿子一回来，又看见他这身打扮，祖父母脸上的雾云消散了，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笑容。晚饭后，前来看望的人们都走了，屋子里静了下来，谈判开始了。我太小，听不懂他们谈些什么。只看到叔父不时坐下站起，不停地打着手势，一会儿大声理论，一会儿又低声细语。我只听出了“以前怎么怎么，现在如何如何，今后什么什么……”祖父母只听不说话。叔父说完，坐在炕头静等回话。祖父沉默了，他用火

镰打火，拿起烟袋不停地吸烟，室内只听见他“吱、吱”的吸烟声。现在想来他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在吸了两袋烟后，他磕掉烟灰，把烟袋递给儿子让他吸，身体向炕角挪了一下，靠在被子上说：“好，按俺孩的主意办。”献十几亩土地给贫苦农民的决策就这样拍板定案了。第二天，村里的干部都来了，中午，叔叔请客，干部们都在我家吃饭，家里非常热闹。祖父写了一张纸，大约是字据吧。来人一片赞扬和恭维，“大爷，叔叔，哥哥”叫个不停。过了几天，村里的业余剧团编了一个戏，戏名叫《凌尔文献田》，村里请我们全家去看，让祖父坐在中间。我们全家都成了剧中人，还有一个小孩扮演我，在剧中给干部们点火吸烟。爷爷边看边咧着嘴笑……祖父经受了“第一次革命”——儿子革老子的命——的考验。

这次和风细雨式的家庭革命，把那个和我们日夜相处的“长工”，我的歪牛叔叔也“革”掉了。他赶着毛驴，驮着两布袋粮食，奶奶给他打点了一个很大的包裹，里面装满了衣物，让他背着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“家”。我看到，他和祖父母都有点依依不舍，他走出门拐弯了，我们还在大门外站了许久许久。

这段时间，婶母担任县“妇教会”（即当时的“妇女救国会”）主席，在外忙着支援前线工作。而解放则寄养在离城五里的王家庄奶母家里。祖父经常带着吃的用的去看他，回来总是对祖母说：“好，又白又胖。”

大约是1947年，真正的革命——土地改革运动——开始了。这次革命可不同于“第一次革命”，它不是请客吃饭，也不是绣花绘画，而是疾风暴雨式的。平静的村庄，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，相邻而居的这个大群体，一下子裂变为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四个阶层；几百口人丁的凌氏大家族，也突然间分成了两个阶级。

当时，中共中央还没有发布《土地法大纲》，土地改革的政策大概依据某位领袖的一篇“报告”行事。这一运动从老解放区首先发动，干部有砸烂旧世界的坚定决心，人民有翻身求解放的热情，因而土地改革在短期内就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。是时，东、西、南三个李家庄从建制上是一个行政村。如前所述，南庄凌氏家族富裕人家较多，穷人较少。所以土改时村公所的干部，东、西两庄较多，而南庄只有两个配角。这就有效地打破了南庄的家族“保护主义”，工作更加顺畅，方法也就更加激进。南庄凌氏的富人们慌了手足，有的外出躲避；有的给村干部送礼，以求庇护；有的则忍痛割爱地将自己十七八岁的闺女，嫁给东庄那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——他是掌“帅印”的村干部……

祖父因为曾用过一个“长工”，因而“富农”这顶帽子就不大不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，似乎连他自己也感觉合适而无可非议。

于是，革命的矛头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这个家庭。

祖父祖母被绳索捆绑在福字院的大门前，受了

皮肉之苦，我吓得坐在墙角颤抖，不敢出声不敢哭。据说此时县委派人来，说这家人不能“动”，因而保住了两位老人的“命”未被“革”掉。

所余的十几亩沟洼地（楼沟）全部没收，分给了东庄的贫苦农民。老丰沟的土地，分给了西庄；四祖父在岭西沟的土地也分给了东庄。

牛和驴牵走了。

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。

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。

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。

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。

1957 年的全家福，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、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。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、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。



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。我们离开福字院，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，它叫小南院……

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，可谓一落千丈。

这个当口，也许还不知道，在破窑凉炕上，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，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，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。

爷爷：“彻底了。这个革命彻底了。”

奶奶：“再苦再难，咱不该用那个长工。”

爷爷：“有一个儿子在家，怎么也不会的。”

奶奶：“孩们都在外头革命。”

爷爷：“咱们得拥护革命。”

奶奶：“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？”

爷爷：“只要孩们在外好，咱们还能活几天？”

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。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，打死就打死了，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，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，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。

我在1969年入党，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。

家庭出身：革命干部。父亲：1938年参加革命，中共党员；母亲：1944年参加革命，中共党员；姑父吕倜中共党员；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；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……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、烈士；伯父凌尔寿烈士……阴暗面没有。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。

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。组织上找我

谈话，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，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：“你还有一个姑姑，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不填进表中？”

我一下子蒙了，赶快写信（那时不可能打电话）询问父亲。父亲来信告诉我：确有一个小姑姑，叫凌尔婉，土改时被斗而死。他并且告诉我，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，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，同时他还说，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，详细说明了情况。第二次再填时，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，并且加上了我对此“人民革命斗争”的积极评价。这时我还是不晓得，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。

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。爷爷毕竟是“双抗属”，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。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。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“献田大会”，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，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，把土地主动献出。爷爷在发言中间，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，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摔出去——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，不是每一个“分子”都能享受到的。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《二月河源》吧：

艰辛的日子开始了。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。每人每天两合玉米，一家四口人，总共八合。幽默一点说，这叫“命中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”。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，怎么办？有糠有野菜。每天早起磨“面”，糠在磨里滚动，像呼呼响的风声，推着自然很轻，转几转，听到“咯嘣”一声，“啊，那是个玉米豆！”一日三餐，就是和这种“面”煮成的糊糊打交道。这“面”也可蒸成窝窝头，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，放干就不足一两

了，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。到夏天，除奶奶在家，我们都去挖野菜，什么车前子、荆籽、苦苦菜、杨桃瓜、榆树叶、马奶子……噢！原来都能吃呀。毕竟，无粮不能养人。没办法，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，回来晒干，碾成“榆皮面”。这是一种黏合剂，和玉米面拌在一起，就可以做面条吃。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“榆皮面”。不料又出事了，村干部在开会时说：“地主富农吃玉茭面，贫下中农吃‘木头面’，这不是翻天了吗！”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。

当时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。祖父让我仲文叔叔（尔玄，我四祖父次子），背着粪筐，手拿粪叉，装作拾粪，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（尔英）家，想要一点吃的东西。姑母吓得惊慌失措，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，而且将自己的堂弟“赶”了出来，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。也就是这个时期，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，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。我说奶奶让我来“看看”您。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。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，问长问短；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；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，塞到我的衣襟里，让我两手抱着；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。她怕街上的狗咬我，拿了一根拐杖，一直送我到村口，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。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，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，难禁眼泪夺眶而出。我喃喃地说了声：“奶奶，我走了。”转身小跑而去。回到家，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，交给奶奶。两位老人皆

二月河的祖父。



密雲不雨

无言语，爷爷把我抱到炕上，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……窝窝头，两个窝窝头，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！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，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。

1976年夏，我回家省亲。一打听，那位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。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，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祷告了很久很久。

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。

是年姐姐十三岁，上初小四年级。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，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，也认识了一些字。

一天，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，斗争的对象是年

仅十三岁的小女孩——姐姐。她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，逼着问她：“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？”原来是为这么个事：姐姐的同桌女同学，叫杨小媛。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，此事有人告了状，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。其实这个家里，有过铜钱，有过解放区发行的“济南票”，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。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，当然没有什么结果。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，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。

会议主持者宣布：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，统统脱下来，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。还不错，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，让男女学生分开，到两个教室进行“工作”。因我年龄小，姐姐拉着我去女教室换衣服。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，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。但她的个头较大，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。最后，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。衣扣扣不住，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……姐姐不说话，没有哭。我吓坏了，想哭，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，三个字：“不许哭！”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。

回家进门，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。

爷爷蹲在炕沿下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。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，呜呜咽咽，凄切啼哭，嘴里不知念叨什么，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。

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。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：爷爷奶奶的长子、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。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，一下子趴在炕上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——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。大家都在哭，谁也不劝谁，也无法劝。爷爷拉了我的小手，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。

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爷爷伤心流泪。

那封信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写给祖父的。抬头是“凌从古先生”，信中说凌尔寿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击日军扫荡时英勇牺牲。说他是民族英烈，全家光荣云云……最后盖有两个印章，一个是正方形大章，是边区人民政府的印章；一个是圆形小章，据说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。

祖父昼思夜想的儿子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他病倒了，睁着眼睛躺在炕上，几天不吃不喝。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：“没有了，没有了……”

姐姐辍学了。我们抬水、磨面、捡煤渣、挖野菜，开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。两年后，姐姐未成年就无声无息地出嫁了，据说换来了两斗小米，几尺红布，姐姐好苦啊！但是，她走了好，走了就不会饿死了。

1947年“十二月会议”，党中央制定和发出了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》的指示，坚决纠正在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。连续发布了《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“左”倾错误》等文件，农村要落实一些政策。祖父的“富农”帽子摘掉了，说是